

# 论马克思“个人再生产”视角下的现代性批判

丁增锋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政治教学部, 江苏 连云港 222000)

**摘要:**“个人再生产”是马克思阐释历史的基本视角,也是马克思审视和批判现代性的基本切入点。通过历史性地考察现代社会“个人再生产”方式的独特性,马克思洞察到一种悖论性的个人存在样式,即“个人再生产”不再体现为个人本质力量的发展,而是“颠倒”为个人之外的并且统治人的资本力量的发展,它成为近代社会发端以来哲学之“颠倒”的现实根源所在。针对现代社会“个人再生产”方式的弊端,马克思确立了奠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实践机制,将其作为实现现代性历史转变以及“个人再生产”方式变革的现实基础,并以此为前提澄清人的观念“祛魅”。

**关键词:**马克思;个人再生产;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性批判

**中图分类号:** B0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42X(2015)05-0008-06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5.05.002

长期以来,人们对现代性的审视乃至批判更多地是从社会类型变迁的视角展开的,其具体做法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相对峙的框架中考察现代社会的历史性特质及其后果,并以此为基础勾画历史的未来走向。从历史作为社会的纵向展开过程来看,此种审视框架无疑有其合理性,但是,诚如马克思所言:“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sup>[1]523-524</sup>,从而社会的变迁或历史归根到底是社会个人共同“生产”的结果,而社会个人共同生产社会的基本前提便在于个人再生产的进行,为此,马克思将“生命的生产”置于历史发生的首要前提之一。这样一来,社会类型的变迁实际上乃是社会再生产和个人再生产的统一。而就两者的地位来看,个人再生产无疑是更为根本的,因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sup>[2]43</sup>。既然如此,为了使得从社会类型变迁的视角出发所展开的现代性批判更加富有成效,我们必须同时坚持从马克思的“个体再生产”的视角出发审视现代性,只有这样,以个人与社会关系为基本内容的现代社会结构变迁及其诸多后果才能获得更加透彻的说明,从而现代性之为现代性的“内核”才能出场。

## 一、马克思的“个人再生产”视角

对于自己唯物主义地阐释历史的出发点,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之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sup>[1]525-526</sup>而由于现实的个人本身就是社会的个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sup>[3]11</sup>。因而“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就既是对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生活过程的描绘,同时也是对社会物质生产生活描绘。两者作为同一的物质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由于“社会个人”的中介而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与此同时,现实的个人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本身又内涵着两个维度,即其既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同时也是个人生命的生产。对于后者,马克思明确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

\* 收稿日期: 2015-09-01

作者简介: 丁增锋(1980—),男,安徽舒城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致。”<sup>[1]520</sup>如此，马克思通过确立审视历史的“个人”视角的同时，便获得了更为具体的把握人类历史的“个人再生产”视角，那就是，人类历史作为个体发展的历史，本身又体现为“个人再生产”及其方式的历史性变迁。

从内容上来看，“个人再生产”本身又体现为两个方面，即其既体现为“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也体现为“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sup>[1]532</sup>，而前者不仅制约着后者，而且尤其体现了人与社会的本质。因而，我们重点来阐明“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从人的存在特质来看，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为自己首要存在样式的，“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sup>[1]519</sup>，而生产活动过程本身就是个人再生产的过程。“生产直接也是消费”<sup>[3]14</sup>，“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自身，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和自我再生产的个人。”<sup>[3]14</sup>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样式，其本身是一种对象性活动，生产的对象性特质表明“人所以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被对象设定的”<sup>[4]105</sup>，这种被设定性表明人是“受动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人由于“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sup>[4]107</sup>，正是在这种追求中，人实现着自己的自我再生产，即实现着自我力量的发展。

从最一般意义上来看，“个人再生产”是任何一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社会的本质在于个人间相互关系的总和，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sup>[5]221</sup>。既然如此，社会的存在从逻辑上来看必定要以个人的存在为前提，只是社会存在之前提的个人并非近代以来广为流传的与社会没有任何关系的社会唯名论式的个人，而是本身就隶属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中的社会个人。对于“个人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赫勒指出：“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而没有自我再生产，任何个体都无法存在。”<sup>[6]3</sup>

进一步来看，“个人再生产”也是社会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之一。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物

质生活生产的发展，其中，物质生产关系构成了历史阶段性划分的核心标尺。但是，物质生产关系本身又表现着个人的再生产，即“生命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即自然关系和生产关系，因而，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变迁作为历史演进的标尺本身又内蕴着“个人再生产”的历史性演进。也就是说，不同的人类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个人再生产”方式，“个人再生产”方式的变迁体现了历史的变迁。从思想史上来看，“个人再生产”视角本身并非马克思的独创，早在其之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黑格尔的理论之中已经就“个人再生产”做出过阐明。例如，对于黑格尔，马克思评价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sup>[4]101</sup>但是，无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还是黑格尔，他们关于“个人再生产”的理论都丧失了本有的历史感，以致将“个人再生产”塑造为“个人一般”的再生产。也正因为如此，“个人再生产”的视角在他们的理论中丧失了诊断历史进程的作用。与此根本不同，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本身内蕴着“个人再生产”，而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sup>[3]16</sup>，因而“个人再生产”也必定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再生产。或者说，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个人再生产”的方式必定表现出历史性的差异，也正是这种差异，使得“个人再生产”视角具备了诊断历史的重要作用。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这种诊断作用尤其体现在马克思基于“个人再生产”视角对现代性之“双重颠倒”批判性审视中。

## 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个人再生产”方式及其双重颠倒

就一般性的关联而言，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个人再生产”的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必定内蕴着独特的个人再生产方式。对此，马克思在论及资本关系主导的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时指出，它“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其他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这就是说，在这个过程

中工人把他本身作为劳动能力生产出来”<sup>[5]450</sup>。其中,马克思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从而也是个人的再生产作为资本关系主导的生产过程的更为重要的结果,既然如此,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塑造的现代性特质也必定体现于内涵于其中的“个人再生产”的独特方式之中。那么,这种独特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呢?为了有效的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行简单描述一下“古代社会”个人再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特质,从而确立一个相互比较的视野。

对于古代社会的历史性特质,马克思总体上将其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其在具体形式上又表现为“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和“封建的”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包括它们各自的“亚形式”)之间固然存在着诸多历史性的差异,但它们共同作为“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又存在着两个内在相关的共同特质。一方面,个人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要以他作为公社成员的身份为媒介。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存在都要以自己所属的共同体存在为前提,并由此受共同体的制约,诚如马克思所言:在“古代社会”中,“虽然个人之间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它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sup>[5]113</sup>。另一方面,这种个人受共同体制约,并由此表现出固定不变的社会特质的关系决定了“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使自己的主体性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sup>[5]476</sup>,在这种互为前提的相互制约中,“个人再生产”便体现为一种重复性的、从而也是贫乏的、片面的再生产,即总是在结果上造成自己原本就有的各种社会规定的重复再现。对此,马克思指出:“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因而经济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是在个人对公社(个人构成公社的基础)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sup>[5]476</sup>在这种个人再生产方式中,虽然个人表现为生产的目的,“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sup>[5]479</sup>,从而显得较为崇高,但这种崇高毕竟是建立在个人贫乏的规定的重复性再生产基础之上的,“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原始关系相矛盾的”<sup>[5]479</sup>。

如果说,基于狭隘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与人对人的关系相互制约条件下的“古代社会”的“个人再生产”体现为个人贫乏的本质力量的再生产,并且其“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sup>[5]490</sup>,那么,伴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不断提升,“个人再生产”方式以及由此所体现的个人本质力量也必定会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依赖于古代社会人和自然的关系与人对人的关系的瓦解,并通过这种瓦解一方面造成大量的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或“共同体”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则造成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本源性所有关系的瓦解,即“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sup>[5]465</sup>。在某种意义上,自主独立的个体从传统纽带的包裹下挣脱出来,可以看作是现代性生成过程中的头等大事<sup>[7]58</sup>,并且,这种挣脱也因为“表现为对作为资本的前导的各生产阶段所固有的种种界限和限制的否定”<sup>[8]41</sup>,从而表现了人类历史整体演进过程的进步性。但是,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个人的独立化并非意味着人摆脱了社会。即如鲍曼所说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当代人只能根据自己的想象和决心来指引自己,也不意味着我们当代人能够自由地、胡乱地、随心所欲地建立自己的生活模式。或者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创造物质财富和设计蓝图的时候,不再依赖于社会。”<sup>[9]10-11</sup>实际情形恰恰是,“资本主义的人从旧的束缚变为自由身,但又进入了服从货币财神的新的隶属关系中。”<sup>[10]90</sup>正是基于这种历史性前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个人再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入地刻画,并从中窥探到现代性的根本缺陷。具体来说,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劳动者所属的新的隶属关系的核心在于雇佣劳动者对资本的隶属关系,这个关系铸就了“个人再生产”的独特方式。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并基于“个人再生产”之为物质生产之内在维度的认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描绘了贯穿于整个历史过程的生产一般特性及其作用,概言之就是,“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sup>[11]207-208</sup>在这个过程中,物质生产作为自己的有目的性的活动的展开,它使生产者自身中蕴藏潜力发挥出来,从而推动人的自我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前提之一便在

于劳动者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以致其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将自己仅存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以便获得再生产自身的物质中介，或者说，“劳动本身只有在被资本吸收时才是生产的”<sup>[5]268</sup>，而劳动过程便同时成为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这一过程显示出两个特殊现象，一是“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二是“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就把劳动本身当作活的酵母，并入同样属于他的各种形式产品的死的要素。”<sup>[11]216</sup>固然，资本生产关系下的劳动者是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但由于不得不以出卖劳动力为前提，资本或作为其人格化体现的资本家“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它现在作为有生产能力的生命力，对资本现存的、因而是死的对象性发生作用”<sup>[5]256</sup>，这种作用最终使得资本得以保存和增殖，“从而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一种属于资本本身的力”<sup>[5]232</sup>，而劳动者个人则在这种生产过程中表现为“去势”，即再生产自己的过程表现为日益贫乏的过程，即“只有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下，赤贫才表现为劳动自身的结果，表现为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sup>[5]608</sup>。由此便可以看出，资本所塑造的现代性的核心特质之一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颠倒，即“个人再生产”不再体现为个人本质力量的发展，而是“颠倒”为个人之外的并且统治人的资本力量的发展，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由此发生分裂。

正是此种“颠倒”构成近代社会发端以来哲学之“颠倒”的现实根源所在。“个人再生产”所应体现的力量生成畸变为资本力量的生产，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受资本关系操控的现实。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基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对此种现实生活领域的“颠倒”作了深入揭示。作为资本关系下“个人再生产”的结果，“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sup>[11]89</sup>这种情形犹如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sup>[11]90</sup>而由于“关系当然只能表现在观念中，

因此哲学家们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上述关系的统治（上述物的依赖关系，不用说，又会转变为一定的，只不过除掉一切错觉的人的依赖关系）在个人本身的意识中表现为观念的统治，而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sup>[5]114</sup>此种观念取向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哲学之中的表现就是，“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sup>[1]546</sup>，即将本属于现实的人的意识或观念颠倒为“一种支配和决定这些人的实践的唯一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sup>[1]546</sup>。如果说，这种理论构造上的“颠倒”是“现代性”所造成的第二层次的颠倒，那么，它在黑格尔哲学中无疑得到了最典型的表现。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再生产与资本再生产相分裂的框架相一致，黑格尔通过将“个体的生命过程=再生产与人的感觉、欲求、思维能力相分离”，并将前者规定为自然发生的过程，从而“表现出将精神人为地、社会性地脱离肉体（劳动）从而把精神（劳动）置于有限地位”<sup>[10]337</sup>，就此而言，黑格尔历史哲学最终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以一种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的方式确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实，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称“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sup>[1]510</sup>。

总而言之，从“个人再生产”视角审视资本塑造的现代性，其在基本特质上表现出物质生产领域和精神生产领域的双重颠倒。为了彻底消除两个领域的颠倒，马克思针对现代社会“个人再生产”方式的弊端，确立了奠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实践机制，将其作为实现现代性历史转变以及“个人再生产”方式变革的现实基础，并以此为前提澄明人的观念“祛魅”。

### 三、基于“个人再生产”方式变革的现代性批判

纵观现代性的发生发展历程可知，对其所展开的批判无疑贯穿于始终。但是，在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取向中，许多领悟了现代性之弊端的现代性批判者总是将立足点置于思想领域，并力图于其中构筑救世的方案，因而归根结底隶属于纯粹理论批判的现代性批判路径。在马克思之前，此种倾向堪称普遍，从卢梭的复归于“自然状态”到法国唯物主

义者的“意见支配世界”再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的乌托邦式构想,从康德的范导性的“目的王国”到黑格尔的思辨理性批判再到黑格尔派的纯粹观念批判,无不如此。而在马克思之后,以卢卡奇开其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普遍秉持的意识或文化批判方案,普遍将现代性的根本缺陷归结于人在意识领域的异化、沉沦或堕落,并以此为前提将现代性历史性转变寄托于文化层面的教导和人的主体性自觉。实际上,当马克思强调指出奠基于现代性批判基础上解放“不是思想活动”时,已然高度概括了以往思想家们所展开的现代性批判的方案共同取向。问题的关键在于,思想领域的颠倒归根到底源自于现实领域的颠倒,从个人再生产的视角来看,就是源自于特定生产关系条件下个人再生产过程的颠倒。既然如此,针对现代性的纯粹思想批判必定难以触动资产阶级社会大厦的根基。由此所造成的结果则是,所谓的现代性批判本身便只能在一种与现实的分裂中虚化为批判的幻像。

与执着于纯粹思想领域的现代性批判路径根本不同,马克思则确立了首要地立足于现实世界改造的现代性批判方案。就缘起来看,这一方案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有预示,其中,马克思强调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1]502</sup>而从个人再生产的视角来看,这一方案的核心便在于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个人再生产的方式,并以此消除个人再生产所内涵的颠倒,还归个人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真正统一,或者说实现社会发展真正体现个人发展的目标。对此,马克思首先基于历史性的视野,一方面科学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再生产本身虽然造成了人的发展的悖反性,但其本身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并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sup>[5]112</sup>。作为特定的历史阶段,它实现了对以往社会的超越,即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sup>[5]111</sup>下的古代社会个人再生产模式要好。与此同时,它也为未来新型生产关系条件下个人再生产方式的历史生成奠定了基础。对此,马克思指出:“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

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sup>[5]479-480</sup>这段内涵丰富的论断,一方面明确指明了新型个人再生产方式是建立在以往历史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再生产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则从两个维度表明了新型个人再生产方式的基本特质,即“全面性”和“变易性”,统一起来便是个人再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自己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过程。

而要实现这种新型个人再生产方式,必须“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为此,探寻瓦解“资产阶级形式”的实践机制便成为马克思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为此,马克思“尝试着去理解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相伴而行的社会分裂现象的形成和发展”<sup>[12]13</sup>,并基于此种理解得出:“一种历史生产形式(同时体现了个人再生产的方式——笔者按)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惟一的历史道路。”<sup>[11]562</sup>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造成的分裂,尤其是个人再生产过程或个人发展过程与社会发展的分裂,只有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中才能得到彻底消弭,即“发展过程本身被设定为并且被意识到是这个过程的前提。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不是使一定的生产条件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sup>[5]541</sup>如前所述,“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核心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衍生出资本主义社会衡量发展的“旧有的尺度”,即将财富的增殖视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尺度,而且内涵着其自身固有的历史性限制。资本的伟大之处在于其通过“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sup>[5]390</sup>来实现自身的“自主化”运行,并由此造成物质财富的巨大发展,但由此同时,这种始终以消除限制来拓展自己的本质性倾向也表明“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sup>[5]390</sup>,并且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定会遭遇自身的界限,具体包括“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界限”、“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的界

限”、“交换价值是生产的界限”或“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sup>[5]396</sup>。归根到底，这些界限表明“资本并不像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sup>[5]396</sup>既然如此，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sup>[5]286</sup>而伴随着资本退出历史舞台，“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sup>[8]100-101</sup>，由此便实现了生产过程与个人发展的真正统一。

如果说，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瓦解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构成了马克思实施现代性批判的实践机制，并且通过这种瓦解真正实现个人再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转变，那么，这种实践机制同时也构成了“反映”个人再生产过程之颠倒的人的观念颠倒的现实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观念领域的颠倒并非单纯的认识论问题，而是实践领域发生颠倒的结果。对此，他明确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sup>[1]501</sup>以此为指引，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系统中的人的观念颠倒即拜物教意识生成的现实根源，即“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sup>[11]90</sup>如果说观念颠倒的“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想形式”<sup>[11]93</sup>。既然如此，要想彻底消除人的颠倒的观念，就必须首先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必须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劳动者才有可能切实“反对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

方式”<sup>[13]258</sup>，并由此真正穿透各种意识形态的幻象。与上文所阐述的实践机制相一致，马克思深刻指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sup>[11]97</sup>

总而言之，马克思基于“个人再生产”视角审视现代性的弊端，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个人通过物质生活活动实现自我发展的颠倒性结果，即个人发展颠倒为与其无关的资本（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揭示了源自于“个人再生产”之颠倒的个人的观念领域的颠倒，并基于对资本之内在本性的分析，规划出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批判乃至超越现代性之双重弊端的实践机制。从关照现实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实践路径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当前发展仍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亦即发展始终要以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真正统一为目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参考文献：

- [1]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德] 马克思.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5]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匈] 赫勒. 日常生活 [M]. 衣俊卿，译.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 [7] 张凤阳. 现代性的谱系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8]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9] [英] 鲍曼. 流动的现代性 [M]. 欧阳景根，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 [10] [日] 内田弘. 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 [M]. 王青，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11] [德]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2] 魏小萍. 文本视域中的马克思 [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4）.
- [13]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系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4 (6): 9. [7] 李瑞清. 清道人遗集 [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1: 156.
- [6] 韦杰.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J].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 2001 (2): 42. [8] 韩庆祥.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与“中国话语权” [J]. 中央党校学报, 2014 (5): 47.

## On the Rol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TAO Xiao-jun

( 1. College of Cultural Industry,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Nanjing 210013, China;  
2. Journal Editorial office,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164, China)

**Abstract:** The academia has experienced a long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scholars have had better and better knowledge of its connotation, and have gradually got to know its huge initiative. The essenc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none other than the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social science, and can participat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scourse power system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social science in ways of both interior infiltration and exterior radiation, with a 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develop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promoting the discourse power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social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the largest rol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establish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social science can be brought into play only by means of the media, and through building the proper pos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ideology, paying attention to form, improving the social affinity of publicity, opening up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in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promoting the ever-lasting development of the classic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discourse power

(责任编辑: 朱世龙)



【上接第 13 页】

## On Modernity Crit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Individual Reproduction”

DING Zeng-feng

(The Political Teaching Department, Lianyungang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Lianyungang 222000, China)

**Abstract:** “Personal reproduction” is a basic view of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lso is the basic starting point of Marx’s review and critique of modernity. Through historically investigating the uniqueness of “individual reproduction” of modern society. Marx insights into a paradox of personal style, namely “personal reproduction” has no longer embodi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essential strength, but “reversed” as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strength rul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which has become the realistic source of philosophical “revers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society. Aimed at the disadvantages of modern ways of social “individual reproduction”, Marx established the practice mechanism basing on the paradoxical movement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put it as the realistil foundation of realizing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modernity and ways of “individual” reproduction, so as to clear the conceptual “disenchantment”.

**Key words:** Marx; individual reproduction; social relationship;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productivity; capitalism; mode of production; modernity criticism

(责任编辑: 朱世龙)